



北京文化發展研究院
Beijing Cultural Development Research Institute

京師 文化評論

BEIJING
CULTURAL
REVIEW

● 改革名宿访谈录

刘道玉 温元凯 马克垚 卢新华

● 名家圆桌：思想与学术40年

王 轶 陆 铭 于 丹 王庆丰 张荣强 祝文燕
倪玉平 刘 岩 刘悦笛 蓝 江 赵 玲 吴冠军
汪明明 吴玉军 李海青 孙 亮 朱 承 刘 翔

- 张立波 分期、趋势和乌托邦：改革开放40年的思想空间
- 杨学功 改革开放40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历史和逻辑
- 武廷海 中国古代城市的“规画”

2018
秋季号
总第三期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北京文化發展研究院
Beijing Cultural Development Research Institute

京師 文化評論

BEIJING
CULTURAL
REVIEW

2018
秋季号
总第三期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京师文化评论. 2018. 秋季号: 总第三期 / 沈湘平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8
ISBN 978-7-5203-3096-1

I. ①京… II. ①沈… III. ①艺术评论—文集 IV. ①J0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00798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冯春风
责任校对 张爱华
责任印制 张雪娇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19.5
插 页 2
字 数 463 千字
定 价 8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主办

主 编 沈湘平

执行主编 程光泉

编 辑 部 沈湘平 程光泉 石 峰 常书红

杨 志 冯正好 赵亚楠

目 录

特稿

分期、趋势和乌托邦：改革开放 40 年的思想空间	张立波 (1)
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历史和逻辑	杨学功 (15)

改革名宿访谈录

高等教育改革的反思——刘道玉访谈录	(64)
改革需要先锋——温元凯访谈录	(79)
从突破教条到建构体系——马克垚访谈录	(98)
痛定思痛话伤痕——卢新华访谈录	(109)

青年名家圆桌：思想与学术 40 年

民法的“照着讲”与“接着讲”	王 轶 (129)
回到常识——从城市发展的规律和政策说开去	陆 铭 (134)
历史的常识与常识的历史	张荣强 (139)
40 年来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倪玉平 (144)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源	孙 亮 (151)
欧陆思想与中国思想	吴冠军 (156)
数字资本、一般数据与数字异化——数字资本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引	蓝 江 (160)
邓小平如何解放了中国人的思想	王庆丰 (171)
使命型政党的自我革命与改革的再出发	李海青 (178)
以理性开放的心态开展思想政治教育	吴玉军 (183)

在思想与学术之间：可否多做点“多点思想”的学术	刘悦笛 (188)
穿越“古今中西”回环的“思想史三峡”	朱 承 (193)
在更高层次上进一步解放思想	沈湘平 (199)

专题：她眼中的40年

精神长空与生命大地	于 丹 (203)
女性承载的辉煌：影响中国女性发展的三个历史事件	祝文燕 (208)
为底层女性发声	赵 玲 (212)
精神的站立	刘 岩 (218)
景观社会中女性的“媒介人格”	汪明明 (222)
身为女性的后现代女性观察	刘 翔 (226)

专题：后现代的知识生产与传播

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时代的历史学	顾晓伟 (231)
次生口语时代的知识生产	赵 涛 (240)
网络知识生产与传播的“三阶秩序”	曲 慧 喻国明 (244)

专题：匠人营国

中国古代城市的“规画”	武廷海 (249)
从北京湾到金中都——北京建都的历史与文化	李建平 (256)

人文观察

差异性视域下的城市空间正义	邹吉忠 黄德平 (264)
混居寓乡与杂居城市——关于北京会馆和四合院大杂院的片言只语	王锐英 (270)
“西体中用”“中体西用”与“中体良用”	何志攀 (278)

影视书评

身体与欲望：《金瓶梅》中的现世主义——格非

《雪隐鹭鹭：〈金瓶梅〉的声色与虚无》评论	李啸洋 (293)
“疯人”不疯：西方电影中的“另类人”	刘天子 (297)

诗情画意

漫画十一幅	杨 志
-------------	-----

Contents

Stage, Trend and Utopia: the Ideological Space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ness	Zhang libo (1)
The History and Logic of the Study of Marxist Philosophy Since the Re- form and Openness	Yang Xuegong (15)
Reflection on the Reform of Higher Education	Liu Daoyu (64)
Reform Needs the Pioneers	Wen Yuankai (79)
“Imitate” and “Inheriting” of the Civil Code	Wang Yi (130)
Back to Common Sense: Start with the Law and Policy of Urban Development	Lu Ming (135)
The Spiritual Sky and the Earth of Life	Yu Dan (204)
The Glory that the Female Bring	Zhu Wenyan (209)
History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u Xiaowei (232)
“Planning” of Ancient Chinese Cities	Wu Tinghai (250)
Urban Spatial Justi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fference	Zou Jizhong; Huang Deping (265)

分期、趋势和乌托邦:改革开放 40 年的思想空间*

张立波**

摘要: 改革开放新时期作为一种“绝对的现在”，其具体构成和意涵随着时间的发展而变化，并影响到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的书写。回顾 40 年来的思想变迁，真理标准讨论具有源初性的意义、价值和地位，现代性的三种逻辑随之展开，市场、物欲和消费营造了一种“超现实”的历史感和美学意识。人类始终需要作为美好意愿的乌托邦，中国梦作为一种新的乌托邦，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了新时代，在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同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关键词: 改革开放新时期 历史意识 中国梦 乌托邦

值此改革开放新时期 40 年之际，方方面面的回顾、纪念和探究都很多，归结起来，大致分为三类：一是专注于个别的事件、人物、思潮和运动；二是聚焦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具体领域的变迁；三是梳理启蒙、市场、国家等诸多观念的盛衰。本文力图围绕历史分期、发展趋势和乌托邦三个关键词，敞开改革开放 40 年的思想空间，或更为准确地说，敞开改革开放 40 年追忆的思想空间。

分 期

在严格的意义上，历史性、历史意识和历史分期都是现代的产物。文艺复兴时期的“现代人”开始关注“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往哪里去”这些历史性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构成了历史意识，或者说，经由不同的历史意识，历史性的问题获得了不同的回答。百年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从一开始，对其性质就有不同的解说，其中之一，就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我们不必拘泥于此一解说，不过，在类比的意义上，或可认为，中国人的现代意识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的。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肇始，历史意识之争即构成现代中国的思想内核。无政府主

* 本文系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道路’研究”(17ZDA03)的阶段性成果。

** 张立波，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义、国粹主义、三民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不同流派展开激烈争论，最终，马克思主义在根本上塑造和定型了我们的历史意识。现代意识内涵历史分期意识，而历史分期从来都不是一项中立的工作，如法国年鉴学派著名代表人物勒高夫所说：“通过历史分期，我们可以表达出对已经发生事情的重视，一种价值判断，即使这是一种共同判断。”^① 1920年代末的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使得马克思主义“五形态论”在社会思想界得到普遍认同。1950年后，中国的近代史、现代史和当代史的构架迅速形成，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构成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主导线索，并由此溯及1840年以来的中国近代史构型。

历史意识是一种现代的意识，一种“现在”的意识，从“现在”出发的意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赫勒对当下、过去和未来所做的辨析富有启发性。按照她的说法，历史性的当下、过去和未来是一个思想序列，历史的当下、过去和未来是另一个思想序列，二者不可混为一谈。历史性的当下呈现为 just now（刚刚）、now（现在）和 being now（正在）三种形式，每一个“刚刚”的行动都具有未来，“现在”作为一个边界，是已经发生的事情和尚未发生的事情的分界线，它总是要被超越的。通过把“现在”置入“存在”的语境中，“正在”出现了，真正的个性是以“现在”相对于“刚刚”和“正在”的首要性为特征的。每一个“刚刚”“现在”和“正在”都是共在的，共同性就是同时代性，就是当代性。“共同性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它是绝对的（当下）现在。”^② 20世纪50年代的“赶英超美”所表现的，是一种急于摒弃“现在”的思想意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这个意识的症结不在于“共产主义”，甚至不在于“跑步进入”，症结在于当时对共产主义的理解有误，没有基于“绝对的现在”予以把握。改革开放新时期，曾经也有过一段“危机意识”，但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我们党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一指导方针。这个论断极为重要，反映了“绝对的现在”意识。“现代人居住在火车站上”，而非急急忙忙地奔向未来。

改革开放新时期作为一种分期，属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的一个分期。对此分期并非没有异议，例如，“后‘文革’时期”就被一些思想者作为物理意义上的对等词来看待。泛泛而谈，把1978年以来的中国社会进程称作“改革开放新时期”，表明的是与“文革”划清界限、分道扬镳的明确的政治意识，而若称作“后‘文革’时期”，表明的是现实生活中划清界限、分道扬镳的不易与艰难。借用赫勒关于“当下”构成的“三分法”，最初的时候，我们用“现在”和“正在”的态度看待“新时期”，“正在”为“现在”提供希望和信心，随着“新时期”的不断展开，“刚刚”越来越多地进入“新时期”的时间意识之中，并为“现在”赋予了愈来愈丰富而繁杂的内涵，“正在”即便不是变得遥遥无期，也不再像最初那样简单而直接地持有动人心魄的激情。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和社会情

① [法] 勒高夫：《我们必须给历史分期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6页。

② [匈] 赫勒：《历史理论》，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4页。

绪下，“后新时期”^①一词突然闪现，不过，使用者甚少，类似的历史意识没有成为主流。

随着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不断展开，新时期内部的分期成为学术思想议题。一些党史专家 1988 年出版的《新时期专题纪事》就论及分期。十年后，《北京党史研究》编辑部也专门邀请几位学者就“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历史阶段应如何划分”展开讨论。相关的探讨不只是关注既往阶段的划分，更是着眼于未来阶段的走向。也就是说，这不只是一个历史编纂学的问题，而是一个历史的社会学乃至政治学、文学、文化学的问题。陈思和 2010 年出版的《新时期文学简史》一书提出，“新时期文学简史”的真实含义应该是“从‘文革’以后到 20 世纪末”的中国文学发展简史，因为太长，就用“新时期文学简史”来替代。严格说来，“新时期文学”只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并没有经过科学论证，既不准确也已经过时。他自陈读过的许多本文学史著作，都没有对这个词做出确定性的解释，学者们大都是出于习惯性的文学观念，把文学看作政治附庸，给某个时期的文学现象加上一个具有政治内涵的时代限制。如“抗战文学”“‘文革’文学”，等等。其实，洪子诚 2000 年出版的《当代文学概说》一书专门注释“新时期”。按照他的解释，“1977 年 8 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大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通常认为，1976 年 10 月江青、张春桥等‘四人帮’被逮捕，便标志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的终结”。当然，“新时期文学”并非随着“新时期”的到来而径直产生，其内涵也不会简单地界定和限制于“新时期”。就文学对时代的塑造而言，新时期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图绘了新时期，构建了我们对新时期的历史记忆。

著名党史专家廖盖隆在为《新时期专题纪事（1976.10—1987.10）》撰写的“序”中指出，从 1976 年 10 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在实际上结束“文化大革命”时算起，特别是从 1978 年 12 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算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的新时期，是“党的六十七年历史、尤其是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 39 年历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这就为改革开放新时期在党史上做出了非常崇高的定位和评价。可以看出，关于“新时期”的起始时间，廖盖隆并用了两个说法，一是 1976 年 10 月粉碎“四人帮”，二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1919.5—1987.12）》从 1919 年 5 月开始记述，把党的历史分为九个时期，分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创立；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从 1976 年 10 月开始，其中，1976 年 10 月到 1978 年 12 月为“徘徊中前进”；1978 年 12 月到 1987 年 11 月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中共成立 85 周年之际，增订新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1919.5—2005.12）》出版，该书将党的历史分为三个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该书把 1976 年 10 月到 1978 年 12 月这段时间称作“在徘徊中前进和走向历史的伟大转折”，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最后一个阶段，“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从 1978

^① “后新时期”一词的使用者中，谢冕和张颐武比较著名，他们著有《大转型：后新时期文化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一书。

年12月开始记述。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新时期历史大事记(1978.12—1998.10)》,把新时期的起始明确界定为1978年12月,也就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算起,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之后出版的增订本《中国共产党新时期历史大事记(1978.12—2002.5)》仍然采用了这一起始时间。

在阐述改革开放新时期的重要性时,廖盖隆把从1935年的遵义会议到1945年党的七大,视作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把从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7年9月十三大,视作“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他把1976年10月以后的12年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76年10月到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两年,这是在徘徊中前进的阶段;第二个阶段,是从十一届中全会到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召开以前的4年,这是完成党的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开始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开始改革开放的阶段;第三个阶段,是从党的十二大到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召开以前的5年,这是进一步改革开放、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阶段;第四个阶段,是从党的十三大开始的深化改革、发展民主和扩大开放的新阶段,亦即全面改革阶段。^①

《中国共产党新时期历史大事记(1978.12—1998.10)》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以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为标志,分为两个阶段。这显然是采用了十四大报告的提法。党的十四大报告专门写了一节“十四年伟大实践的基本总结”,其中明确指出“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以邓小平同志的谈话和今年三月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为标志,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关于此一“新阶段”,党的十五大报告也专门写了一节“过去五年的工作”。“大事记”的“前言”写道,两次中共全国代表大会报告的这两个基本总结,勾画了我们党新时期历史的“基本轮廓”,是学习和研究新时期历史的“基本指针”。^②“前言”还写道,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和十四大,这个阶段内的历史发展,还可以进一步细分为两个或几个小的阶段,党史界对此有不同的主张,但主要有两种,这两种都主张再分为以拨乱反正为主要内容和以全面改革为主要内容的两个段落,但一种以中共十二大为标志来划分,另一种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来划分,该书采用的是前一种主张。《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1919.5—2005.12)》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起步(1978年12月—1982年8月);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1982年9月—1992年1月);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2年1月—2002年11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2002年11月—)。

一个历史时期的形象会随着时间而改变。2008年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年,以

^① 廖盖隆:《序》,载黄见秋等编《新时期专题纪事(1976.10—1987.10)》,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第1—4页。

^②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新时期历史大事记(1978.12—1998.10)》,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

“改革开放新时期”为主题的文章很多，据中国知网的文献检索，标题中冠有“改革开放新时期”字样的文献，2008 年有 71 篇，2009 年有 38 篇；以“改革开放新时期”为主题的文献，2008 年有 178 篇，2009 年有 129 篇。在诸多的纪念和研究中，围绕“两个三十年”发生了争论。前 30 年（1949—1978）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后 30 年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新时期。出现了两种极端的观点，一种是用后 30 年否定前 30 年；另一种是用前 30 年否定后 30 年。为此，《人民日报》2009 年 8 月 17 日刊文指出，“两个三十年”虽然在发展阶段、发展水平上有所区别，但却是构成为新中国 60 年辉煌历史的“两个三十年”，二者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相辅相成的关系，共居于新中国 60 年的辉煌历史之中。基于这样的认识，学术界探讨了一些比较具体的“关系”问题，比如，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改革的关系，关于党的八大及其前后的探索与改革开放的关系，关于“文化大革命”前十年的探索与改革开放的关系，关于毛泽东的探索对改革开放的贡献，关于周恩来 1972 年调整和邓小平 1975 年全面调整与改革开放的关系，关于“文革”与改革开放的关系，关于 1976 年至 1978 年的历史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与改革开放的关系，等等。^① 2013 年 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的讲话》中强调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两个时期都不能否定。这就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写作确定了基调。

历史分期具有双重作用，“它可以更好地掌握过去的时间，但也可以强调历史作为人类知识工具的脆弱性”。^② “改革开放新时期”概念的内涵与构成，影响到中国近代史的书写，最为突出的表现是，现代化范式取代了革命范式，晚清和民国时期若干重大历史问题上的基本观点得以改变，概念性框架也被重构，历史写作的方法也被重新界定。^③ 1998 年出版的两卷本《重新认识百年中国》颇有象征意义，此书封面有言：“一百年来的中国近代史不仅仅是一场革命史，一百年来的中国近代史实际上是一部现代化史。”雷颐在为该书所写绪言中指出，“对近代百年历史的重新认识与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几乎同时起步就不是偶然的了”，因为“时代精神”已有激烈的“革命”“斗争”转向现代化追求。^④ 承认历史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持续不断的对话，“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也就自然而然、水到渠成。

2017 年召开的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们的奋斗目标是“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毫无疑问，“新时代”是一个历史分期的概念，属于改革开放新时期内部的一个阶段化。这一新的阶段会调

① 参见胡安全、宋曲霞《中国改革开放历史起源问题研究综述》，《中共党史研究》2012 年第 4 期。

② [法] 勒高夫：《我们必须给历史分期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16 页。

③ [美] 李怀印：《重构近代中国——中国历史写作中的想象与真实》，中华书局 2013 年版，第 211 页。

④ 雷颐：《〈重新认识百年中国〉绪言》，改革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 页。

整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内部构成,对其他阶段的意义和地位造成影响,更会对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历史意义和地位做出重大拓展。

趋 势

在历史哲学的论域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一个追问:历史究竟是进步的还是退步的?依据我现有的认知和判断,如果必须给出一个回答,那肯定毫不犹豫地选择“进步”二字。但若允许我再做补充,那么,必须要指出,我所理解的进步不能简单地视作褒义词,甚至不能简单地视作中性词。进步作为一种意识,是现代的;进步作为一种观念,是意识形态的。甚至于追问某个具体的历史事件是进步的还是退步的,也是在一种意识形态的论域中展开的。现代社会的一切意识形态,包括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内,在根本上都是进步论者,都相信历史是不断进步的,区别只是在于进步的节奏感不同,衡量进步的标准不同,以及,进步的最终目标不同。

回顾改革开放40年间的社会发展,我们很难说其中只有一种趋势。在事实层面上,有几种趋势并行不悖;在价值层面上,人们的价值趋向也有很大不同。关于趋势的探讨势必关联到逻辑,泛泛而谈,趋势总是某种逻辑中的趋势,就此而言,逻辑先行,脱离具体的逻辑无法指认趋势;然而,逻辑又是在趋势中形成的,只有通过某种趋势的梳理、勾勒与指认,才能产生逻辑的命名。因而,我们对于趋势的探讨,需要结合逻辑来进行。按照赫勒的观点,“每次我谈到发展逻辑时,我都是在谈论社会一本体论的具体化的过程”,“一种趋势一旦被发动,它很快就会盛行,并将被具体化,因为它会发展出在各种不同情境和环境中保持自己同一性的能力”。^①现代社会不能不是进步的,只要走上了所谓进步的轨道,就只能沿着这条轨道一路前行乃至狂奔,才能保持不掉队、不落伍、不被开除“球籍”。

1972年,中国政府明确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允许外国人在中国投资,中国也不向外国输出资本。外贸部1974年的一篇文章也明确表示:“社会主义国家根本不会引进外国资本或共同开发本国或其他国家的资源,根本不会同外国搞联合经营,根本不会低三下四地乞求外国的贷款。”邓小平1975年复出后,明确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一定要发展生产力,还强调指出,要发展生产力,关起门来是不行的,必须对外开放。1978年,邓小平访问日本,在乘坐“风一样”快的日本新干线高速列车时,深感中国与世界的落差。他说:“我们现在需要跑。”其时,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不仅同发达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扩大,而且还被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远远甩在了后面。关起门来搞不成现代化,中国的国门必须打开,不然就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就此而言,开放是改革的前提和基础。^②怀着可

① [匈]赫勒:《现代性理论》,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95页。

② 在邓小平的思想中,现代化、世界和未来具有一体性。1983年9月,邓小平为北京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1985年5月27日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再一次提到,教育必须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能被开除“球籍”的强烈危机意识，邓小平大笔一挥，在中国南海边画了一个圈，开始书写“春天的故事”。^①

这个“春天的故事”就是改革开放的故事，利用外资的故事，发展生产力的故事，包括外交政策在内的一切政策服务于国富民强的故事。1978年12月，“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被正式写进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利用外资的政策得以确立。1980年3月，中央在广州召开由广东、福建两省参加的会议，会上正式将“出口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改革从放开市场开始，农贸市场、小商品市场、生产资料市场、技术市场、劳动力市场、资金市场、资本市场，等等，从商品市场到要素市场，中国的市场体系在改革开放的在潮中孕育成长。1992年1月，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对姓“资”姓“社”这一羁绊中国发展的“历史性难题”给出了总结性答案：“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市场经济终于正式写入党的文件，进入中国经济社会生活。从“计划经济”到“计划为主、市场为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市场经济”“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直到在拉开全面深化改革大幕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代表党中央进一步宣示“市场要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被提到了空前的高度。这一进程，是对生产力的一次又一次“松绑”的进程，也是思想解放的进程。

在邓小平理论中，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具有重要的位置。1988年6月，邓小平同志根据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和现状，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间，我们加入全球化的行列，首先就是秉持技术的逻辑，加入技术发展的大趋势中。由此我们想起1984年出版的一本书《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方面》。此书写于1982年，阐述的是美国当时的社会趋势，却在中国轰动一时。如今看来一些趋势已经成为当今主流现实，而一些在当代中国仍是正在发展的趋势。作者指出的十个趋势中，一是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二是强迫性技术到高科技与高情感相平衡的转变，这两个明显属于技术领域的趋势；四是从短期向长期的变化，八是从等级组织到网络组织，这两个也跟技术发展趋势密切相关。对技术趋势的预言是《大趋势》的核心饶有趣味的是，作者奈斯比特此后陆续出版了《亚洲大趋势》和《中国大趋势》。

在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思想趋势时，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具有源初性的意义、价值和地位。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本无什么精深和深奥之处。但在当时的社会政治境况中，冲破了“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推动了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为我们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做了重要的理论准备。1978年12月22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① 余孝忠等：《从“小平小道”到民族复兴大道——写在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之际》，《经济参考报》2014年8月22日。

公报有这样一段述说：“会议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历史地看，这一讨论引发了四个方面的成效：第一，注重物质生产实践而非政治运动，发展生产力成为头等大事，为此需要发展科学技术，需要尊重知识分子；第二，注重群众而非领导意志，日常生活需要受到重视，世俗生活和民间文化应运而生；第三，注重自主选择而非外在规律，主体性得以伸张，文化的作用得到承认，中国特色凸显；第四，注重现代化的逻辑而非革命的逻辑，制度建设得到重视，管理现代化、政治现代化、经济现代化乃至人的现代化都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现代性具有历史想象和技术想象两种想象机制，二者相反相成。科学作为现代性的主导性阐释，渗透了生活的方方面面，作为实践、制度和行动的模式，塑造了现代性的三种逻辑：技术的逻辑；社会地位的功能性分配的逻辑；政治权力的逻辑。第二种逻辑最基本的机制，是市场关系的共通化和普遍化，第三种逻辑在根本上也就是国家的逻辑。每一种逻辑中至少存在一种趋势，严格来说，每一种逻辑中存在两种或三种趋势。技术逻辑中的发展趋势似乎只有一种，社会和政治领域的发展趋势却不是整齐划一的，也远非是线性的。通常所说的富强、民主、文明，富强服膺于技术的逻辑；民主属于政治权力的逻辑，文明合乎社会的逻辑。回顾过去40年间的发展，我们很容易发现，三种逻辑之间存在冲突、张力和矛盾。这里仅以“人文精神寻思录”的讨论为例。

1994年第3至第7期的《读书》杂志，连续刊发了以“人文精神寻思录”为题的一组讨论，引发了国内人文学界对这一话题持续两年多的大讨论，大小报刊广泛地予以报道，国外有些报纸也做出反应。《光明日报》《文汇报》等报刊还开辟了专栏，1995年后，人文学界以外的一些学者也开始加入，譬如，1995年11月某天的《中华读书报》上有一个很大的标题：“人文精神，经济学家发言了。”就这场讨论的发起者而言，“我们今天置身的文化现实是远远不能够令人满意的，甚至可以说它正处在深刻的危机之中”；作为这危机的一个重要方面，“当代知识分子，或者就更大的范围来说，当代文化人的精神状态普遍不良，人格的萎缩，趣味的粗劣，想象力的匮乏和思想、学术的‘失语’，正是其触目的表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丧失了对个人、人类和世界的存在意义的把握，在基本的信仰和认同上两手空空”。发起者还认为，“知识分子或文化人的这种普遍的精神失据，并非仅由他们自己所造成，而是在近代以来的历史过程中，由各种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因素合力造成的”。^①我们不能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确立市场经济体制一年多的时间后，人文学者就恍若置身于“荒野上的废墟”，感受到“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觉得“整个社会的趣味和心态日益粗鄙”？必须承认，市场经济正是1980年代不遗余力地为改革开放鼓与呼的人文知识分子的追求，当这一追求成为眼前的现实时，他们却表现出陌生、反感、厌恶、排斥……

欲望究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还是万恶之源？这是人文精神寻思提示的一个重要

^① 王晓明：《人文精神寻思录》，文汇出版社1996年版，第272页。

问题。人是有思想、有灵魂的，也是有肉体、有欲望的。改革开放前，人的思想被引导大公无私，肉体则是受到禁锢，欲望受到抑制，这和当时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具有直接关联，轻工业的发展被忽视，民用工业的发展更是严重滞后。这在当时是经济发展的必要，国防建设的必要，保持国家长期稳定的必要。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发展生产力成为首要任务。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在谈到农村中层问题时，肯定了安徽省肥西县包产到户和凤阳县“大包干”的做法，认为“效果很好，变化很快”，至于有人担心会影响集体经济，邓小平表示“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关键是要发展生产力”。^① 1980年9月2日，国务院批转《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工作情况报告和今后意见的报告》，批准从次年开始起把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工作，在国营工业企业中全面推开，使企业在人、财、物、产、供、销等方面，拥有更大的自主权。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对搞活经济、促进生产发展起了明显的作用。在这样的过程中，1982年流行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被誉为“知名度最高，对国人最有影响的口号”。“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也成为耳熟能详的一句名言，为此，工作是为了赚钱，赚钱是为了享受，关于人生的意义问题有了林林总总、形形色色的答案。

“我消费，故我在”，消费在个人生活中的地位空前提高，消费时代突然而至。消费作为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指利用社会产品来满足人们各种需要的过程，包括生产消费和个人消费。改革开放前，个人消费是不受鼓励的，节俭是美德，“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属于老生常谈。熟悉西方经济学的人们都知道，根据凯恩斯的总需求决定国民收入的理论，节俭对于经济增长并没有什么好处，消费力增强，整个社会的发展才有动力。改革开放新时期，通过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社会全面发展，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也不断得到满足。与此同时，对“虚假需求”的批评也显露开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法兰克福学派提供了理论武器。按照他们的观点，需求是人类进步的标志，但大众传媒引诱人们扩大不合理的欲望并牟利，人们只能获得虚假的满足，成为虚假需求的奴隶。然而，何谓真实需求？何谓合理消费？今天的城市已然成为符号、传媒、符码生产的场所，商品的实在性意义也在趋于消失，“仿像”文化消费具有越来越大的比重，物质消费被转化为一种意识形态意义的美学消费，文化叙事和视觉艺术的各种手段都被用于消费意识形态的构造。本质上说，消费社会营造了一种“超现实”的历史感和美学意识。

从实践的逻辑到物的逻辑，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启蒙似乎已经成为现实，生命中难以承受其轻或其重的现实。何谓自由，何谓幸福^②？个体和类的矛盾，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的矛盾，过度富裕与民主不足的矛盾，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矛盾，自由迁徙的农民工和留

^① 黄见秋等：《新时期专题纪事（1986.10—1987.10）》，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第104页。

^② 2012年中秋、国庆双节前期，中央电视台推出了《走基层·百姓心声》特别调查节目“幸福是什么？”。记者们分赴各地采访包括城市白领、乡村农民、科研专家、企业工人在内的数千国人，“幸福”一时间成为媒体的热门词汇。“你幸福吗？”，这个简单的问句背后蕴含着一个普通中国人对于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自然环境等方方面面的感受和体会，引发当代中国人对幸福的深入思考。